

# 分析当下：霍尔与情势的相遇

霍尔是谁？2014年2月10日，在他辞世之际，在不同的悼文之中，他是英国文化研究巨匠，他是牙买加社会活动人士。他是多元文化之父，他是“撒切尔主义”的造词者，他是文化理论家、社会学者、文化研究学者、左翼知识分子。每一种命名之后或许都会留下一位洞悉身份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窃要者的一丝讪笑。

他创办了大名鼎鼎的《新左派评论》，却最终黯然离职。在他率领之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如日中天，他的女性主义学生却起来“造反”，可他分明是一位女性主义学者的丈夫。他让文化研究从英国伯明翰一隅之地出发，最终枝繁叶茂，他却以社会学教授身份退休。他曾任英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却被“正统”的社会学者视作黑户（hack sociologist）。当然，他还是爵士乐迷，阿森纳队的粉丝。

还有在不同语言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书写着的是他对接合理理论的巧妙运用，他于表征的透彻解读，他编码解码理论的独特贡献，

曾有学者讥讽过，文化研究的历史书写一直都有沦落为学术恋尸癖和科研腐食动物的地盘之忧。我们没有必要象料理后事执行遗嘱的律师一般盘算霍尔的学术遗产，也不必急着研讨后霍尔的文化研究，办上一场学术水陆道场。其实这种盖棺定论式的热潮，早就预演过一次，早在霍尔退休之际，对他以及他作品的赞喻与批评之辞已日益旁证膨胀。Polity, Sage, Routledge等主流出版社争相出版了霍尔的学术评传。对文化研究的历史的讲述，被含糊的术语诸如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统一在一起，而霍尔则当成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具体象征。在很大程度上，霍尔被当作了文化研究对社会政治生活成功参与的保证，甚至他就是人格化的文化研究，尽管很大程度上他本人的思想又拒绝这种保证，理应成为不作保证的思想。

虽然霍尔长年致力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对他本人以及他作品的研究却正在成长为一个跨学科的学科。一方面霍尔被供进圣坛，被不断当作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被另一些学者重新磨砺，当作现实斗争的武器。将霍尔的思想送进批量生产的工场和知识交锋的战场的可能同样存在。最耐人寻味的是，他晚年的一篇文章标题便是《分析当下》(Hall & Massey, 2010)。

## 第一代新左派

伊格尔顿曾经说过：“任何人要想创作一部关于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小说，他起笔于创造出几个联系着不同倾向、不同阶段的虚构人物形象，最后他会发现，这些人物都是在重新发明霍尔。”自然，霍尔的一生几乎就是大半部新左派思想史或者文化研究学术史，但这并非因为他风云际会，生逢其时。霍尔的学生格罗斯伯格曾认为文化研究其本质是激进的情境论。霍尔正是这样面对不同的历史情势（conjuncture），从特定的问题意识出发，不时地对社会现状进行分析。霍尔曾说过他是一个“外乡人”，这固然是指他流散的族裔身份，可又何尝不同他在社会政治与学术两个场域的真实写照。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影响到英国工党的政策，却始终不参与政治政党。他在学术界名噪一时，甚至从不认为自己是学界中人，反倒对学术界作为体制空间耿耿于怀。(Hall, 2013c: 772)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象牙塔中的学究，而更像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毕竟他参与创建的“文化研究是关于文化作为一个独特领域，但它更多地是关于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

目前尚无一部完全的霍尔作品全集，甚至很难清晰地分别在诸多书脊上冠以“Hall et al(霍尔等)”中哪一些具体由他亲自操刀。这一事实体现了霍尔所倡导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公开大学乃至英国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传统：许多重要的作品和研究项目均是合作产生。他本人反对以选本、读本、全集等方式出版他的作品，主要他不愿以在这种选编过程中生产出对他作品本来不具备的一致性。当然，分散的文章更便于他根据现实，不断地作出修订与重述。他关于媒体研究、文化研究发展的几篇文章如明显存在前后演进关系，甚至在遣词造句上都流露出痕迹。因此，对霍尔的充分了解，不能仅仅他的文本出发，而要从他所面对的时代情势，才能理解他是如何思考与理论化。

斯图亚特·麦克菲尔·霍尔出生在牙买加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族中有黑人、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等血统。1951年，19岁的霍尔获得了罗德奖学金，负笈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就读，刚到牛津，他与充满贵族气的传统格格不入，很自然他受到利维斯、那批批评的影响。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提到在他的牛津岁月里，他购买每一期的《细绎》，如同那是圣经中的一章。(Hall, 2013c)然而对文本的细读难以疏解身份焦虑，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则让人更为倾心，直至投身其间。

五十年代末国际政治风云激荡，一方面反殖民浪潮勃兴，另一方面冷战格局基本形成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矛盾重重，虽然他带反殖民主义观念离开牙买加，但并未与西印度群岛的独立运动发

生直接联系，反倒是积极投身于更广泛的左翼社会运动。1956年，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与苏联入侵匈牙利，冷战的格局之下，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同时对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霍尔选择成为第一位新左派。他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离开牛津，直接投身于各种社会运动。他与他夫人就结识于反核扩散运动的社会运动之中。1958年，他将《大学与新左派评论》与汤普森所创办的《新理性者》合并成为大名鼎鼎的《新左派评论》，并成为该杂志的第一任主编。拉斐尔·塞繇尔、查尔斯·泰勒、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森乃至拉尔夫·米利班等当时英国左翼的风云人物无一不是《新左派评论》的主要撰稿人。霍尔也成为了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不同与他的大部分同道不同的是，他是其间为数不多的黑人。时至今日，《新左派评论》仍是国际学界重要的思想理论刊物，激进知识分子仍以其马首是瞻。

1958年发表于《大学与新左派评论》的《无阶级感》(Hall, 1958)，是霍尔新左派时期的代表作品。当时英国工党内部有观点认为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将会导致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到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需要不复存在。霍尔并不简单地在物质生活与工人阶级感之间作判断：“无阶级”应该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感觉，而不是一种基本的事实。”。霍尔指出工人阶级文化的基础是它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但是，“生活方式必须在一定的关系模式以及一定的物质的、经济的和环境的影响下才能够维持下来”(Hall, 1958: 27)。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使得工人阶级“从生产者成为消费者”(Hall, 1958: 28)，“整体的生活方式’分裂为一系列生活风格，这意味着对于许多工人阶级成员而言，生活现在成为一系列碎片化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阶级不平等的客观决定因素更不真实了，只是这些因素被阶级混乱感或者是无阶级的虚假感所感受。“工人阶级通过陷入新的和更加精致的奴役形式而解放了自己”。(Hall, 1958: 31)

此时的霍尔虽然还没有成为他后来所说的“葛兰西派”，也未尝使用诸如“霸权”、“接合”之类的理论概念，但他的分析明显跳出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教条，他相信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一定有一种“自由发挥”的关系，上层建筑的转变同经济基础领域的转变同样具有决定性。丹尼斯·德沃金认为“它已经昭示出后来成为持久性标志的两个特征。首先，他开始对现状进行公正的和客观的分析。在他看来，这是在既定条件下寻找抵抗潜能的唯一途径。第二，通过利用正反两方的观点，他故意避开思想与政治争论中的对立问题，而这种对立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很盛行的。”{德沃金，丹尼斯，2011 #710}这种对于工人阶级经验变化的分析成为了此后贯穿霍尔一生主要议题。或许他不像霍加特与威廉姆斯可以回望童年的工人阶级文化，他对于文化研究的形成最为独特的贡献在于，干预当下的迫切感。

1964年出版的与韦纳尔合著的《大众艺术》是霍尔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这本书与后来霍尔的作品有着明显的思想上的差异，却无疑是霍尔思想的地平线。他并不是从学术研究进入大众文化领域，而是通过与新左派的联系，从另一层面进入这一领域。这本书正是他“前文化研究”的新左派生涯与“文化研究”思想的承先启后的转折点。在这本书中他形成了后来一以贯之的思想，文化不仅仅只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反映，而更具有构建作用。他挑战了传统的高文化好，低文化不好的思维模式，同时又力图区分大众文化 (popular culture) 与民间文化 (folk culture) ,群众文化 (mass culture)。在这本书中他坦言来自霍加特、威廉姆斯以至利维斯的影响。而有趣的是，在这本书中完全没有提到马克思，虽然很容易从中找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由于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经济决定论的不满，霍尔在研究上保持了距离，不过这个距离按他的话说是，一响之地 (shouting distance)。

1967年，霍尔与威廉姆、汤普森等人共同编辑了《五一宣言》，作者包括伊格尔顿、米利班。这本作品更多地讨论现实问题而非学术理论，加之此文的另一版本编者只著名威廉姆斯，所以往往也为学术界在讨论霍尔时所忽视。《宣言》分工党与新帝国主义、社会现实、新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社会主义政治几部分，着重分析在英国，工党执政之后所谓的混合经济或者后资本主义其实只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不义依旧存在，金融资本侵蚀着社会经济，普通公众的基本需要如医疗、教育仍让步于管理资本主义。仅靠工党的议会政治无法真正改变社会。虽然难以考证，在《五一宣言》之中具体霍尔落墨多少，但纵贯其一生来看，此文不仅上承《无阶级感》，下启八十年代他对撒切尔主义的揭示，乃至二十一世纪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2013年在《宣言》再度重印，而与此同时，霍尔又参与发表了他最后的作品《基本本宣言》。

## CCCS到U203

1964年，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创办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霍尔从四十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参与了创建CCCS，并在1968年霍加特离开后接任主任一职。不同于他在新左派时期的作品，六十年代以降，反主流文化、身份政治成为霍尔的关键议题。霍尔通过自己的努力定义了“伯明翰学派”，一系列集体性的研究成果中在众多领域取得了极具影响的学术贡献，并开创了诸多新兴的学术领域。”全面改造了

关于媒介、异端、种族、政治、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话语体系。”(Morley & Schwarz, 2014)

1972年霍尔在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的工作论文集第3卷中发表了《新闻照片的决定》(Hall, 1972a), 这篇文章明显受到巴特符号学的影响。此后他又陆续写作了《越轨、政治与媒体》(Deviance, politics and the media) (Hall, 1973a)以及对图片新闻杂志Picutre Post(Hall, 1971, 1972b)的分析。当然在这一系列采用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的媒体分析文章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在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铅印论文集第7辑上发表了《媒体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使他后来颇受传播媒体研究学者关注的“编码-解码”理论。他采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证, 媒体话语不是呈现意义, 而是在社会生产、流通与消费中生产意义。这篇文章的一个更正式和更广为人知的版本《编码/解码》于7年后在重新编辑的伯明翰工作论文集《文化、媒体、语言》中出现。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58手稿)》的影响,事实上他还曾在工作论文集中发表对《大纲》研讨的文章(Hall, 1973b)。这篇文章实际上开启了后来被接受研究的学术领域。

1976年出版的《仪式性反抗》则不仅是冠以“霍尔等著”的重要作品, 也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甚至英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品之一。全书含十九篇作品, 包括理论一、民族志、理论二、方法四部分。大部分作品来自霍尔的弟子。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为了文化研究领域现今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如迪克 海布迪支、保尔 威利斯、安吉拉 麦克罗比、格雷厄姆 默多克等。署名霍尔等的《亚文化、文化与阶级》(Hall, Clarke, Jefferson, & Roberts, 1976)长达数十页, 是一篇作为全书导言性质的文章, 正在此文出现了对于亚文化的重要定义: 这是青年通过风格协调他们的阶级存在。类似于《编码/解码》引发了受众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仪式性反抗》(Hall & Jefferson, 1976)则引发了亚文化研究。

《仪式性反抗》出版2年后, 霍尔参与编辑了《论意识形态》(Hall, Lumley, & McLennan, 1978)。这也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系列作品中理论性最强的一部。书中霍尔亲自执笔的文章有两篇《科学的腹地: 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Hall, 1977)和他与此书另两位编者共同写作的《政治与意识形态: 葛兰西》(Hall, Lumly, & McLennan, 1977)。同书中还收录了对卢卡奇、阿尔都塞等人理论的介绍。这本书明晰地显示出对霍尔思想形成的两个重要理论资源葛兰西与阿尔都塞。

《论意识形态》出版的同年霍尔参与编辑了《监控危机》(Hall, 1978)此书被有的评论家当成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最成功的研究作品。这本书源自1972年11月的汉茨沃斯事件。一个爱尔兰工人在伯明翰的汉茨沃斯被几个黑人少年抢劫殴打。这种被称为mugging的行为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仪式性反抗》一书已有了对此事件的最初反应。《监控危机》则将对mugging的研究放到了“道德危机”的语境中。在方法论上《监控危机》与《仪式性反抗》基本相同, 也同样显现出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虽然这两本书中所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 一个是白人工人阶级的亚文化, 另一个则是作为少数民族的黑人。但两本书都是对战后英国的文化进行民族志纪录性与结构性的解读。这两部作品不仅纪录大众媒体对白人青年亚文化, 还是黑人青年犯罪的担心, 以致对社会道德堕落的恐惧, 而且更深入地分析这种道德危机如何在大众媒体和社会心理中被生产出来。而事实上这种道德危机其实只是英国社会危机的一个隐喻。被媒体所斥责的亚文化或是mugging, 以致后来其他的道德危机中的民间恶魔(folk devil)在霍尔等人眼中, 不过只是社会危机的替罪羊。虽然这本书探讨的七十年代的社会事件, 但其理论意义并未因时光而消退, 2010年伦敦骚乱之后, 人们不禁再度回到这部作品寻找答案, 2013年此书被再版。

1979年, 霍尔离开伯明翰大学前往开放大学任教。不同于在伯明翰大学主要从事研究生阶段的教学, 开放大学类似于中国广播电视大学, 霍尔回归到成人教育的领域中来, 或者按他的话说, 大众教育(popular pedagogy), 影响那些算是被传统的教育系统抛弃的社会成员。霍尔开设的课程被称为U203的大众文化学位课程,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多媒体课程, 从1982年至1987年, 大约六千人学习了这一课程。霍尔与大卫莫利、托尼贝雷特, 保罗威利斯, 这一课程真正将文化研究带到了大众的层面。由于不少课程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深夜播出, 因而也有人戏称霍尔成了失眠者最熟悉的面孔。此后, 他又开设了D213《理解当代社会》课程所采用的教材不少成为了文化研究甚至社会学的必读书目, 如《现代性的构成》(Hall & Gieben, 1992), 《现代性及其未来》。霍尔在开放大学课程的另一著名成果是《表征: 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Hall, 1997)一书。这本书采用结构主义符号分析剖析了摄影、漫画、文学、广告、肥皂剧等被传统学术研究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揭示出大众文化背后的阶级、种族、性别等问题。在序言中霍尔写道: “文化与其说是一组事物(小说与绘画或电视节目与漫画), 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 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文化意义不只‘在头脑中’。它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 影响我们的行为, 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

《监控危机》一书出版后一年, 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当选首相。从1979年至1990年保守党政三度执政, 然而其间却是GDP大幅下降, 失业率大幅上升, 英国甚至自工业革命以来首度成为纯进口

国。这种政策与政党形象的反差，自然成为研究当今媒体文化、政府公关对公众影响的绝佳个案。霍尔将此视为战后英国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历史转折点，他将保守党这种意识形态上成功操作命名为撒切尔主义，并从意识形态表征的角度进行了批评。他先后在《今日马克思》、《新社会主义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于1983与1988年结集为《撒切尔主义政治》、《通向复兴的艰难之路》。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成功是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想像的因素，比如英国性、帝国主义的怀旧、爱国、道德价值等，这些想像是以回归的现代化与权威主义的大众主义为特征的。1989年9月起，霍尔在《今日马克思》杂志陆续发表文章，此后重新修订并结集出版了《新时代：九十年代政治的变化》霍尔提出撒切尔主义是资本主义对新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回应，而新左派也应当作出自己的回应。他认为撒切尔的答案是退回到狭隘的英国认同，而霍尔则提出了“认同作为族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s ethnicity”)。这一系列作品，成为了霍尔作品中最受争议的部分，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对他提出了批评。其中《撒切尔主义》一书中对霍尔的批评最为典型，主要认为霍尔过度强调了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事实它并不具备霍尔所认为的那种权威，而霍尔又过于忽视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方面。事实上这一系列相互争论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关于撒切尔主义与新时代的研究领域。在最后几篇关于新时代的文章中霍尔提到了撒切尔主义对族性(ethnicity)这一概念的追求。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的流散(diaspora)、后殖民、多元文化等概念引起了霍尔的浓厚兴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写下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如1987年的《最小的自我》1988年的《新族性》以及1997年的《何时是后殖民》。霍尔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大超越了传统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研究，而形成了新的认同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研究，前者强调对文化团体和集体的百分之百的义务与认同，而霍尔则强调差异，自反性与偶然性。

## 重新发明自己

1997年，霍尔退休后，用他学生的话说，他重新发明了他自己。一方面，他持续地进行知识生产：1999年正当视觉研究方兴未艾之时，他参与编辑了《视觉文化读本》(Evans & Hall, 1999)他继续讨论着多元文化问题(Hall, 2000a)，质询着当今天“谁的身份认同”(Hall, 2000b)，思考着差异(Hall & Schwarz, 2007; Hall & Sealy, 2001)，当然他还回顾着第一代的新左派(Hall, 2010)，(Hall, 2007)，为文化研究留存在鲜活的记忆。而另一方面，他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各种社会事务之上。

2000年霍尔对于族论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论被一部报告所再度阐发。退休后，霍尔参与了多元种族委员会(Runnymede Trust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Multi-Ethnic Britain)工作，并实际上影响了英国大伦敦地区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制订。2000年，该委员会发布了《多元种族的未来：帕雷报告》，这项开始于1998年旨在推动种族平等的工程，霍尔虽然并未担任研究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但他的影响十分明显。报告指出英国历史上就是种族多样的，而非人们想像的单一民族的社会，文化与传播机构对种族与文化差异的表征不尽人意。霍尔参与这项报告，相对他的其他作品显得不寻常。当霍尔从大学退休后参与这一项目，行为本身更证实了对他的标签不应当是理论家或是政治家，而是一个文化批评者。

这份报告一发表成为英国新闻报道的头版，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其间自然也有不少质疑。报告发表一周后，2000年10月19日在霍尔在位于米尔顿·凯恩斯的开放大学发表演讲《多元文化问题》作为回应。演讲中，他力图区分：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文化问题：“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是向少数种族的人群和社团发言的话，那么，多元文化问题，在我看来，则关心社会总体的性质，并由此表达每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在演讲中，在文字里，霍尔力图回答差异中的相同性是如何被想象和建构的。同时，他仍在身体力行，将自己的观念付诸社会实践。他担任了Autography(黑人摄影师协会)主席，筹建位于Rivington Place的国际视觉艺术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Visual Arts)。尽管对于一个身负重病，每周都要透析两次的老人来说，担任了两个组织的主席已是难堪重荷，他还要开始募款与各种公立私立机构打交道，而这项目工作有时甚至带来的不仅是辛劳，而是羞辱。

2007年9月23日，在Rivington Place开幕之际他接受了英国《卫报》记者Tim Adams的访谈，霍尔坦诚，之所以会将致力兴建这样一所中心，是因为在911之后，一切变得更为迫切。“在前911的社会，差异无所不在，混杂无所不在”然后此后，不同社区间的误解与无知被加深。(Tim, 2007)。于霍尔而言Rivington Place就是力图建起跨越鸿沟的桥梁。在与比他年轻得多的新一代黑人艺术家的合作中，他开始对黑人主体性的探索，他的名字不断地变成铅字，不过不是在学术期刊上，而是在英国乃至欧洲的画廊展出目录上。而在年轻一代黑人艺术家的眼中，他的人生已然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John Akomfrah and Smoking Dogs' film《斯图亚特 霍尔项目》(The Stuart Hall Project)，三屏装置艺术《未完成的对话》(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

## 新自由主义革命

2011年8月伦敦爆发社会骚乱，持续数日的骚乱源自黑人社区，因此有人视作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霍尔认为，社会阶梯最下层的孩子们高度异化，无人准备帮助他们。他有组织的政治声音，没有黑人，没有左翼。而由于消费主义，他们情感的成了洗劫商店。而导致这一切的是，“消费主义把每个人放进了单一的频道”(Williams, 2012)

2011年9月2日霍尔在《卫报》撰文《新自由主义者的征途》(Hall, 2011a)探索自2007年以来横扫西方社会的金融危机的本质。这固然是一场金融危机，同时也是一场政治危机，乃至文化与社会危机，将金融危机视为“新自由主义革命的长征”(Hall, 2011a)此后，他又将此文扩充为《新自由主义革命》先在《Sounding》杂志(Hall, 2011b)发表，此文被收录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一书之中。他似乎意犹未尽，又再度将此文扩充后在《文化研究》(Hall, 2011c)杂志发表。当人们以为文化研究的霍尔，会从表征，从电视，从文化来谈当下的这场危机之时，他却从“操蛋的金融体制谈起”(Hall, 2013a: 27)他坦称，这是刻意为之，因为“文化研究是关于文化作为一个独特领域，但它更多地是关于文化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Hall, 2013a)他似乎是有意识地与已被体制化的文化研究拉开距离，以一个很不文化研究的姿态再一次分析当下。

在他之前大卫·哈维就已书写了一本《新自由主义简史》(Harvey, 2005)，而早在1998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的撰文，探讨新自由主义的危机(Hobsbawm, 1998)。布迪厄也曾讨论过《新自由主义的精华》。甚至新自由主义革命这一词汇也并非霍尔的专利，2005年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中，就已经有了“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的说法(Saad-Filho & Johnston, 2005)。

新自由主义也并不是霍尔，或是文化研究习用的话语。尽管，他早在八十年代就对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撒切尔主义开展的批判。然而，霍尔的文章仍然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事实上他不仅是在作一场学术上的争论，而是引发更为广泛的公众的思考与讨论。此后，霍尔迫切地感到了“当精英们试图利用全球资本的危机再次稳固权力之时，已经没有时间退让”，他再次走了出来挑战新自由主义的胜利(Hall, 2013b)他与等学者编撰了Kilburn宣言，这一宣言计划从2013年底起，分十二篇推出，每篇作为Sounding杂志的主打文章。霍尔去世之时，已刊发了六篇，其中霍尔亲自参与撰写的就有两篇：《新自由主义之后：分析当下》(Hall, Massey D, & M., 2013)与《常识新自由主义》(Hall & Alan, 2013)，此外还包括从经济、代际、性别等角度反思新自由主义情景的若干篇章。霍尔还撰文引介这一宣言(Hall, 2013b)。

金融危机只是掩盖了推进新自由主义革命。(Hall, 2013a: 12)他将，金融危机视为更广泛的经济现象，具有政治后果，又以源自特定的文化变迁。

将其称之为革命，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他解释之所以赋予革命之名，在于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霍尔承认新自由主义其实未必是一个很好的名词，它太过简约，无法体现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不同类型上的差异欧洲的社会市场，亚洲的国家资本主义，俄罗斯的寡头国家，拉丁美洲的金融实验。不过这种命名倒是“政治上的需要”(Hall, 2011b)

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之中，霍尔格外强调，情势的概念，情势(conjuncture)是这么一个阶段，在社会不同领域出现的矛盾、问题与对立开始走到一起，开始积累，开始整合，开始互相叠加。意识形态成为经济问题，反之亦然。(Hall, 2013a: 16)，情势是一个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矛盾在社会中起作用，并结合在一起给予社会独特的影响。历史正是从一个情势走向另一个，而不是持续进化流程。(Hall & Massey, 2010: 55)不同的矛盾可能成为主要部分，他曾使用这个词来指那些较短时间的危机，诸如里根主义危机，布什危机，反恐战争危机，然而他又用这一概念来指代从1970年代直到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源自“经典”自由主义经济与政治理论。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在资本积累的循环中的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只是“取决于自由意志出卖劳动力者”，“只有一个前途——让人来鞣”(马克思, 2004: 204)经济上的自由市场与政治上的自由观念无法和谐共处，奴隶贩子手捧自由宣言实在太过怪诞。古典的自由主义于十九世纪开始衰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正是新自由主义者拥抱了国家干预政策，为此后的福利国家描绘了最初如的模板。只是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者非历史地启动这一段故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大众社会兴起，情势的改变使得新自由主义的不断演进。二战后，至少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福利社会与混合经济几乎成为共识，而在英国，1979年当资本主义危机再次到来之时，撒切尔抓住时机向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开火。当年，正是霍尔在撒切尔上台之前就敏锐地发现，并创造了“撒切尔主义”一词，加以批评。自撒切尔以降，布莱尔、卡梅伦早已将二战后形成的福利社会一再鲸吞蚕食，通过私有化将混合制经济点通过市场化，最终以解决债务为名直接消减政府开支，改变了福利国家。

他发现以往的经济危机，要么带来激烈的社会革命如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要么带来激进的社会变革，如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一方面直接催生了新政，以至后来的福利社会；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法西斯主义。然而此次的危机却并未如以往带来这样的变动。很明显对此经济决定论解释不通。“重要的

是，不将情势简化为一个经济现象。这是经济与社会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融合。”(Hall, 2013a: 16)

霍尔认为，新自由话语推出了两个话语形象：纳税人与消费者。前者被描绘成辛苦劳作的工人被过度这种流行的市场主导的话语正是一套意识形态表征。抽税资助了好吃懒作的吃福利者，而后者被描绘成幸运的家庭主妇，自由地在市场上挑选为特别定制专门派送的种种选择。而这两个形象难道不是本身就需要社会服务的社会的公民吗。

这套话语并不只停留在西方发达国家，它自然也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但“全球管治的主要目的只不过是保护市场与投资，维持资本主义全球企业攫取成功的条件。”(Hall, 2011b: 21) 在《分析当下》一文中，霍尔进一步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维度、意识形态与冲突、源头与扩展、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如何成为了西方世界的大众常识。“新自由主义的规则已经嵌入了常识，将全部人口物质性与想像地收编到金融化与市场化的世界观中”(Hall et al., 2013: 9)。换言之，“新自由主义观念已经沉淀为西方的想像与大众的常识”(Hall et al., 2013: 14)而“常识不是僵化与不变的，它不断地自我变形。”

在这里，霍尔体现了他典型的新葛兰西立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当商业化四处横行，无往不利之时，“市场文化”的规则便确立起来成为霸权式常识，与此同时竞争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大力弘扬，穷人自然被视作不值得同情的。每个人都是产品的消费者，产品带线路人的是个人的经济优势，而不是满足个人需求的社会存在。自然对于快餐式满足，对于成功的幻想，对技术的崇拜，生活方式战胜物质实体，“身份”商业化与自我实现的乌托邦。(Hall et al., 2013: 16)

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则被当作强化新自由叙事的又一次机会。不过，尽管“新自由主义带去往日决裂的野心、深度与程序，确已建立起一个霸权，殖民了不同的场域，影响了常识，转变了社会结构”(Hall, 2011b: 26)霍尔并非绝望，尽管“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成为了经济常识，而且不仅是西方，也是全球性的，政治上、社会上，阶级与其他的社会阶层已经被消费资本主义重构为碎片。”但他使用自己惯有的新葛兰西立场：霸权是个微妙的概念，会带来懵懂的思考。胜利没有永远或最后的。霸权要持续地努力、维持与更新。被排除在外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共识并未赢取，他们的利益并未被考虑，他们构成了抵制运动，反抗，替代性策略与愿景的基础，挑战霸权体系的战争重新开始。(Hall, 2011b: 26)

或者说，在他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里，霍尔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面对一次又一次历史与政治情势，霍尔一次又一次从具体的问题意识出发，着眼于一个又一个在地的分析，因为“危机是潜在的改变的时刻，但解决之道的本质并未给定。”他一直保持着“理智的悲观主义与感性的乐观主义”。

2014年2月10日，霍尔去世。

2014年4月10日，理查德·霍加特去世

2014年4月13日，厄尼斯特·拉克劳去世。而2014年恰好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设立五十周年。

或许我们真地该喊出“文化研究已死，文化研究万岁”，如果文化研究者还能象霍尔那样面对下次情势，分析下一个当下。

Evans, J., & Hall, S. (1999). *Visual culture : the reader*. London: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Hall, S. (1958).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Autumn*(5), 26-31.

Hall, S. (1971). Life and death of Picture Post. *Cambridge Review, 92*.

Hall, S. (1972a). The determination of news photographs. *Working Paper in Cultural Studies, 3*, 53-88.

Hall, S. (1972b). The social eye of Picture Post. *Working Paper in Cultural Studies, 2*, 71-120.

Hall, S. (1973a). Deviancy, politics and the media. In P. Rock & M. McIntosh (Eds.),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London: Tavistock.

Hall, S. (1973b). A "reading "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 to Grundrisse" (Vol. 1). Birmingham: CC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all, S. (1977). The hinterland of science: ide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Working Paper in Cultural Studies, 10*, 9-32.

Hall, S.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New York: Holmes & Meier.

Hall, S. (1997). *Representation :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 (2000a).

Hall, S. (2000b). Who needs identity. In P. Du Gay, J. Evans & P. Redman (Eds.), *Identity: a Reader* (pp. 15-30): Sage.

- Hall, S. (2007).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0(1), 39-49. doi: 10.1177/1367877907073899
- Hall, S. (2010). 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 *New Left Review*, 61, 177-196.
- Hall, S. (2011a, 12 September). The march of the neoliberals. *The Guardian*.
- Hall, S. (2011b).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Soundings*, 48(1), 9-28.
- Hall, S. (2011c).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Cultural Studies*, 25(6), 705-728. doi: 10.1080/09502386.2011.619886
- Hall, S. (2013a).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by Hay, James).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 10(1).
- Hall, S. (2013b, 24 April). The Kilburn Manifesto: our challenge to the neoliberal victory. *The Guardian*.
- Hall, S. (2013c). Stuart Hall Interview: 2 June 2011 (by Vincent Hudson). *Cultural Studies*, 27(5), 757-777.
- Hall, S., & Alan, O. S. (2013). common-sense neoliberalism. In S. Hall, D. Massey & M. Rustin (Eds.), *After Neoliberalism? The Kilburn Manifesto*. London: Souding.
- Hall, S., Clarke, J., Jefferson, T., & Roberts, B. (1976).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a theoretical overview. *Working Paper in Cultural Studies*, 7/8.
- Hall, S., & Gieben, B. (Eds.). (1992). *The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in association with Open University.
- Hall, S., & Jefferson, T. (1976).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for]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Hall, S., Lumley, B., & McLennan, G. (1978). *On Ideology (reproduction of Working Paper in Cultural Studies 10)*: Hutchinson/CCCS.
- Hall, S., Lumly, B., & McLennan, G.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Gramsci. *Working Paper in Cultural Studies*, 10, 45-76.
- Hall, S., & Massey, D. (2010). Interpreting the crisis. *Soundings*(44).
- Hall, S., Massey D, & M., R. (2013). After neoliberalism: analysing the present. *Soundings: 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53(1), 8-22.
- Hall, S., & Schwarz, B. (2007). Living with difference *Soundings*(37), 148-158.
- Hall, S., & Sealy, M. (2001). *Different : a historical context : contemporary photographers and black identity*. London: Phaidon.
-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m, E. (1998). The Death of Neo-liberalism. *Marxism Today, November/December*, 4-8.
- Morley, D., & Schwarz, B. (2014, 10, February). Stuart Hall obituary. *The Guardian*.
- Saad-Filho, A., & Johnston, D. (Eds.). (2005). *Neoliberalism\_ A Critical Reader*. Ann Arbor: Pluto.
- Tim, A. (2007, 23 September). Cultural hallmark. *The Guardian*.
- Williams, Z. (2012, 11 February). The Saturday interview: Stuart Hall. *The Guardian*.
- 马克思, 卡. (2004). 《资本论》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